

文史哲博士文丛

汉赋文化学

◎ 郑明璋 著

齊魯書社

责任编辑\赵发国
刘西浩
封面设计\公冶繁省
版式设计\张薇



ISBN 978-7-5333-2246-5



9 787533 322465 >

定价: 29.00元



文史哲博士文丛

汉赋文化学

◎ 郑明璋 著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赋文化学/郑明璋著. —济南: 齐鲁书社, 2009. 8
ISBN 978 - 7 - 5333 - 2246 - 5

I. 汉… II. 郑… III. 汉赋—文学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37232 号

汉赋文化学

郑明璋 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220 千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33 - 2246 - 5

定 价 29.00 元

序 一

明璋同志告诉我，他的博士论文就要出版了，要我作序。明璋是我心爱的学生之一，我自然很愿意在他论文出版时说几句话。

上世纪90年代初，明璋考上山大中文系硕士生，跟我研读中国古代辞赋。据我观察，他大概是当时中文系研究生中最用功的学生之一。我每次到他宿舍窗前探视，总是见他坐在桌前静静地读书写作，无一例外。他带着厚厚多圈的近视镜，就是他整天研读用眼不息的结果。我敲敲窗，劝他出去走走，活动活动，他总是笑笑，连说不要紧。我有个科研项目，即为两汉赋作评注，这是一项新工作。我分给他任务最重，但他却完成最快。他先后完成的初稿总在十万字以上。

硕士毕业后，我曾一再鼓励他考博，因为我特别喜欢他，以为这位学生是一个可造人才。但他因家庭原因，只得暂时停学，回临沂母校执教。在此期间，他经常应人之邀，合作撰写论文。他分担工作量往往最大，但署名又往往放在最后。他个人也发表不少有分量的论文。我喜欢书法，想整理王羲之父子的著作。我提出与他合作，他虽极忙，但却马上答应，并很快完成初稿。我因种种原因现在还无法定稿，但将来当能完成。

明璋有很强的进取心，他从来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学术成

就。在2003年，他又考取了山东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专门研究先秦两汉文化与文学，特别是汉代文化与汉赋创作之间关系的研究，明璋用力更深。在读博的三年时间里，他坚忍顽强，全然不顾生活的各种压力，全部身心投入学习，一门心思搞好科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发表了数篇优秀的学术论文。这些学术论文，起点更高，视野更阔，理论性更强。

现在，明璋的博士论文又要出版了。我约略阅读了明璋的著作，发现该论文有很多值得学术界注意的地方。例如，关于经学与汉赋的关系，明璋认为：“汉赋的兴旺发达几乎与经学同步，那种认为汉赋的衰落就是由于赋家对经学回归的想法是不客观的。”关于汉赋的颂美和讽谏，明璋认为：“颂美是一种历史进步，是人的地位提高的象征。”他还认为：“汉赋讽谏意识的弱化是就汉赋具体作品中讽谏意识所占的比重和阅读时的效果而言的。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汉赋的讽谏意识是在逐步加强。”至于颂美和讽谏的矛盾，明璋将之归结为话语理解的差异等。关于骹纬与汉赋创作的关系，明璋认为：“骹纬在汉赋中的表现具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本书没有完全否定骹纬的文学价值，尤其重视分析骹纬对汉赋艺术上的浸润。”关于道家与汉赋的关系，明璋认为：“道家思想在汉赋中的表现具有三个不同的阶段性特征。”这是以前的研究者没有提出过的。明璋的著作还论述了先秦和两汉的时间观念对汉赋作家生命意识的深刻影响以及汉人生命观在汉赋中的不同形式，详细地分析了汉赋作家把故意打乱时间的正常顺序当作一种超越时空限制的艺术手段，这种手法既承袭前人，又有着发展和创造。他认为，汉大赋的空间世界与楚辞以及先秦时期的其他作品中的空间世界既有联系又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在它以前的空间世界

基本上是玄拟虚构，而汉赋则没有离开大汉帝国现实的地理空间。作为一位青年学者，能够提出这样一些有一定理论深度的见解，是值得学术界的人们注意的。

我坚信，在未来的学术研究的旅途上，明璋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我期待着。

龚克昌

2009年3月30日于山大

序 二

据调查，中外关于“文化”的定义有百余种之多。伴随文化在人类各项实践活动和生活领域中潜在影响的不断深入，对“文化”这一概念的理解肯定还会继续深化，并不断给予新的界定。明璋博士的《汉赋文化学》，既然是从汉代文化的视角切入研究汉赋，就必然对“文化”概念做出认真的思考。“文化”包括有如下主要层面的内容和属性：文化是人类在从事自身改造和对外部世界改造的实践活动中，所逐渐形成并积累起来的一些东西，既包括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物——即物质层面的东西，也包括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思——即精神、制度等层面的东西。文化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它既表现出很强的固有特点和继承性，同时伴随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变化甚或消亡。作为精神财富层面的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巨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在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下的人，必然要受到该社会有形的和无形的文化的影响，他既是作为“社会的人”而存在，同时也是作为“文化的人”而存在，世界上完全脱离文化的超人是不会有的。因国家、民族、地域等条件的不同，因而不同文化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在阶级社会中，文化具有阶级性。如此等等。我认为，就今天的认识而言，上述明璋对“文化”主

要内容及属性的思考和界定，是准确和到位的。

正是在认真体察和把握了“文化”这一概念最主要内容和最基本属性之后，明璋结合汉代文化发展的特点，选取几个重要的与辞赋创作联系紧密的文化现象，从宏观的角度切入，对汉代辞赋的生成、发展、演化、内容、艺术特色、审美好尚等与汉代文化之间所存在的复杂联系，做出了深入而具体的论析，从而揭示出汉代属于“文化”层面的底蕴作用，对汉赋创作所起到的潜在的影响，给我们提供了许多耳目一新的认识。

汉代文化是先秦文化的继续和发展，先秦文化中的许多因素在汉代新的社会环境下，又呈现出新的面貌和特征，并影响及汉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汉代文化本身具有动态的发展过程，受到文化影响的汉赋创作也同样具有动态的发展过程，在对这种双重动态过程的关照中，十分注意研究文化的诸多因素对汉赋创作诸多表现特点的影响，从而寻觅文化与汉赋创作的连接点，就能够立体地透析出汉代文化与汉赋创作所存在的密切联系。本着这样的思考，明璋集中选取汉代经学文化与汉赋，汉代道家文化与汉赋，汉代时空文化与汉赋，汉代艺术与汉赋，以及汉代衣食文化与汉赋等几个重要问题，进行了具体深入的研究。我认为，这较之平面的研究或个案的、孤立的研究某一具体问题，更能动态历史地、全面系统地把握汉代文化影响及汉赋创作的全貌，以及具体深刻地剖析汉代文化影响及汉赋创作的机理。应该说，这是一次对汉赋研究所做出的有益尝试。

我们从事学术研究都有共同的感觉，从事宏观研究往往易流于空疏，从事微观研究又往往易流于拘泥，宏观和微观的结合是研究问题的最佳选择。而要做到这一点，透视和比较的方

法是不可或缺的。所谓透视，说白了就是综合分析形成某一事物的诸多因素；所谓比较，就是在或纵、或横、或两两、或多重的对比中认识事物的异同。因为任何一种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个体，该事物与他事物总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相统一而存在，相对立而发展。事物所具有的这种复杂联系的本性，就决定我们要真正认清某一事物，就必须使自己的头脑也复杂起来。读过《汉赋文化学》之后，我感觉到明璋在研究中有意识地注意到了这些方法，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如认为，先秦儒家思想经汉人改造后，形成汉代主流的意识形态，其突出的表现就是汉代的经学文化现象。经学文化影响汉赋创作主要表现在：“经学的理念影响了汉赋作家对题材的选择，促成了赋家在对定一尊、大一统观念和儒家仁政思想的极力阐发。”经学所具有的强烈政治情节，影响及汉赋的尚实特征；汉赋的发展几乎与汉代经学的发展同步，突出表现为“创作意图由颂而讽的转变，风格表现上由尚奇至典雅，和理性精神的增加”。如认为，汉代道家文化影响汉赋创作呈现明显的阶段性，西汉中后期道家文化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特别指出扬雄的辞赋创作“体现出力图调和儒与道的矛盾冲突，并进一步向道家淡泊沉静的精神追求的靠拢，同时又加入了‘玄’的因素，与前期有着明显的不同”。道家“道”的本体论，影响及汉赋的风格特征，“汉代赋家，正是从老庄的思想中找到了艺术创作的最佳表现形式，并赋予浪漫表现手法以新的特质”，虽然都有以大为美的追求，但老庄尚虚，而汉赋尚实。如认为：“没有空间世界及其结构，便没有了汉赋。开展着的空间是汉赋一切表象形式的统率者。在汉赋的结构形式中最常见的是对三维空间结构形式的展示，这对汉赋的叙事

结构方式影响甚深。”并强调汉大赋的空间世界与楚辞及先秦其他作品中的空间世界有一定区别，“前者重再现，后者重表现；前者重体物，后者重抒情；前者重外，后者重内”。如此等等，更多类似的新见解，读者自可阅读体会，不烦我在此赘述。但我要说的是，这许多见解都是作者有意遵循上述研究思路和方法，经过潜心研究，所得出的属于自己的结论，其中的深刻之处固然能给人以启迪和深思，即使对某些问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入甚或有值得商榷之处，也能引起汉赋研究者的重视和探讨，它们都对汉赋研究起到了开拓领域和深化研究的作用，是为汉赋研究所做出的可贵努力。

明璋为人本分厚道，讲义气，重然诺。特别是在学业上刻苦用功，兀兀独行，孜孜以求。从读硕士起就专门从事汉赋研究，三年读博又完成了《汉代文化视角下的汉赋研究》的博士论文，又经两年多的修改加工，终于要付梓出版了，我怀着欣喜的心情表示祝贺。同时，我更希望明璋在充满坎坷、艰辛而又伴有无限欢乐的学术攀登之路上继续攀登，追求“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最高境界。

是为序。

王洲明

2009年3月14日

于山东大学第五宿舍寓所

目 录

序一	冀克昌	1
序二	王洲明	1
绪论		1
第一章 汉代经学与汉赋		19
第一节 经学视野与汉赋重大题材的选择		20
第二节 讖纬与汉赋		42
第三节 儒家诗教传统与汉赋讽颂		60
第四节 一尊一统的神圣与汉赋包揽宇宙的快意		77
第二章 汉代道家与汉赋		93
第一节 汉代道家的阶段性特征及其与汉赋的关系 ...		94
第二节 道家本体论与汉赋的艺术构成		119
第三章 汉代时空文化与汉赋		136
第一节 先秦时间观与汉赋作家的生命意识		137
第二节 时空视角与汉赋的结构生成		152

绪 论

80年代以来，汉赋研究走过了值得人们欣慰的历程。随着社会改革和思想解放的深入进行，汉赋研究也有了空前的发展。研究人员数量不断增加，研究的领域范围不断开拓，研究的新方法、新视角层出不穷，历史性的纵向考察和社会性的横向审视不断深入，源流论、作家论、作品论、文化论、思想论、艺术论不胜枚举，学术性的研讨活动空前活跃，汉赋研究的专门著作也不断涌现。

龚克昌先生的《汉赋研究》针对汉赋作家有类倡优的批评，提出不能用抬高经学的方式来否定汉赋；针对汉赋放弃或弱化讽谏，龚先生认为这是作家要求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大胆探索文学艺术发展的规律、追求文学艺术形式美的表现；针对汉赋的“虚辞滥说”，龚先生认为这是文学的浪漫主义手法，是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因此，他认为应该从两汉的时代精神来理解汉赋的发展与衍变。

随后有姜书阁的《汉赋通义》。姜书以释义、溯源、考史、综论、思想内容、结构形式、句法句式、音节声韵构筑全书。他主张对汉赋这种文学现象进行深入的探讨和适当的批判。书中用力最多的是汉赋音节声韵的研究，但他对汉赋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认识偏于庸俗社会学，有失客观。刘斯翰的《汉

赋：唯美文学之潮》和章沧授的《汉赋美学》从审美的角度详细分析汉赋的审美特质，为汉赋美学的开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万光治的《汉赋通论》、康金声的《汉赋纵横》、阮忠的《汉赋艺术论》、曲德来的《汉赋综论》、程章灿的《汉赋揽胜》、曹道衡的《汉魏六朝辞赋》、高光复的《赋史述略》和《汉魏六朝四十家赋述论》、马积高的《赋史》、郭维森与许结著的《中国辞赋发展史》、毕庶春的《辞赋新探》、叶幼明的《辞赋通论》、何新文《中国赋论史稿》、张清钟的《汉赋研究》、简宗梧的《汉赋源流与价值之商榷》和《汉赋史论》、曹淑娟的《汉赋之写物言志传统》、张正体的《赋学》、李曰刚著的《辞赋流变史》、郑良树的《辞赋论集》、朱晓海的《习赋椎轮记》、何沛雄的《汉魏六朝赋家论略》和《汉魏六朝赋论集》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汉赋进行了分析，为开阔汉赋研究的视野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学术论文的发表在本时期也声势浩大，限于篇幅，我们在此不一一赘述。

纵观这一时期的汉赋研究，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研究方法多样灵活，交叉性学科研究开始出现。在这一时期，虽然仍有人以社会学的标准批评汉赋，但更多的人则着眼于汉赋的文体特征和审美特征，心理学、文化学、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文献学、文艺学、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普遍渗入汉赋研究。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如汉赋与经学、汉赋与史学、汉赋与哲学和汉赋与社会文化等也在进行，研究的多元化局面得以形成。第二，整体性研究的力度加大。研究者开始倡导文学史的宏观研究，对传统的研究方法进行整合与改造，促进了汉赋的系统研究，一部分学者在研究中通观两汉时代、汉

赋作家及其赋作，涉猎汉赋诸多方面的问题，使汉赋研究呈现为整体研究的态势。

前人及今人的研究成果给我们以巨大的启发，那就是我们必须把汉赋放在汉代这一特定时代的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下去考察，以审视错综复杂的各种文化现象与汉赋创作的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演绎出汉赋这一文学样式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真正认识汉赋的实质，也不可能真正领会汉赋发生、发展和衍变的原因之所在。随着理论界汉赋研究的逐步深入，我们越来越坚信这一点。这是我这部拙作的理论基础，是我们从事汉代文化视角下的汉赋研究的一个支点，也是我选择这个题目作为我的研究对象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文化这一概念已经越来越多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之中，成为人们频繁使用的叙述语言。什么是文化？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1952年时曾对1871年到1952年间有关西方的文化学概念进行一次总结，在其搜罗到的一百六十四种关于文化的定义中，大致有以下六种：描述性的定义、历史性的定义、规范性的定义、心理性的定义、结构性的定义和遗传性的定义。在此基础上他们将文化定义为：“文化是由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致和传递；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它们在人造器物中的体现；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即历史地获得和选择的）观念，尤其是它们所带的价值；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是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①

^① 见傅铿《文化：人类的镜子——西方文化理论导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

《苏联大百科全书》给文化的定义是：“文化，是社会和人在历史上一一定的发展水平，它表现为人们进行生活和活动的种种类型和形式，以及人们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文化这个概念用来表明一定的历史时代，社会经济形态，具体社会、氏族和民族的物质和精神的发展水平（例如，古代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玛雅文化），以及专门的活动或生活领域（劳动文化、艺术文化、生活文化）。“文化”这个术语从较狭窄的意义来看，仅指人们的精神生活领域。”^①

这些定义能够给我们一些启发，但是就中国的具体情形而言，一些中国文化学的研究成果和学者对于文化的定义，更接近于前苏联学者的定义，也更切合中国的实际，更能让我们接受。

《辞海》认为，文化“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巨大影响和作用于一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阶级社会中，它具有阶级性。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文化具有民族性，通过民族形式的发展，形成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连续性是文化发展历史连续性的基础”。^②

① 转引自陈华文《文化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② 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1533页。